

“新”文科何以“兴”文科

——基于新文科内涵考辨、组织逻辑的思考

■张 苏 张忠华

摘 要:从知识生产变革和科学范式革命的视角来看,新文科的提出突破了传统非此即彼的科学部类划分方式,重塑了具有可通约性的文科新范式。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生产方式变革、学术组织结构的异质化、知识话语自西方中心主义向全球化的权力向度转移是新文科建设的三重逻辑遵循。面向未来,从单一学科建制到网络化知识集群的新文科知识的主体性建构;从刚性学术单元到松散耦合学术社群的新文科学术组织的主体性建构;从欧美中心视点回归本土话语诠释的新文科学术话语体制的主体性建构可成为新文科建设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新文科;内涵考辨;组织逻辑;知识生产;范式革命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中国德育原理百年发展史研究”(编号:BEA210110)。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24)10-0064-09

作者简介:张苏,女,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博士(上海 200237);张忠华,男,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江苏镇江 212013)。

DOI:10.16477/j.cnki.issn1674-2311.2024.10.001

自2018年新文科概念提出已有近六年,然而学界对其愈演愈烈的讨论与实际践行中相对缓慢的推动进程形成截然相反的态势。究其根本,学界尚未对“新文科何以兴文科”这一命题形成深层共识,对新文科是什么、新文科相较于传统文科究竟新在何处、新文科的建设路径应如何与传统文科相区别等问题尚未厘清,相关解读多数依赖于《新文科建设宣言》等国家实践层面的宏观指导性文件,对于理论层面的新文科概念的理解、新文科建设中人文社会科学规律基本遵循的认识仍显不足。鉴于此,本文试图从知识生产变革、科学范式革命的视角,对新文科的内涵特征、组织逻辑进行审思与阐释,进而为新文科建设提供建议,助力提升新文科计划践行的深度和广度。

一、新文科的内涵考辨

对内涵的考辨,决定着我们对新文科这一概念

的认识和理解,也将构成我们讨论这一新事物相关议题的逻辑起点。从概念源起来看,“新文科”最早由美国一所私立文科学院希拉姆学院(Hiram College)提出,其所阐释的新文科是一种“文科+新技术”为特征的文科教育新模式,意在将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中,以应对技术革命冲击下文科式微的困境^[1]。显然,该学院力图打造的是一种技术化的专业文科教育,这一导向下的新文科是工具理性在文科教育领域的延伸。然而,我国新文科提出伊始就伴随着对技术化时代“知识整体性”消解的反思,提倡新文科与理、工、农、医等学科在知识划分与研究方法上边界的跨越。从本质上来说,新文科的探索正是对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生产体系变迁和学术研究范式转换的回应。因此,关于新文科的内涵解读与意义建构,我们不能局限于国别、概念出现的时间先后或者概念的语义本身去考察,而应该从科学发展的宏大叙事中、概念所嵌入的广阔时代背景中去考辨其真正的

内涵。

(一)作为“科学部类”的新文科

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作为不同的科学部类共同构成了人类知识总体。从知识史来看,人类首先关注的是自身的精神、思想、社会关系等,相应发展出文学、哲学、历史、法律、宗教、艺术等方面的认识成果,对自然界的认识较为滞后。17世纪后,自然科学逐渐从人文知识的母体中分离出来,并迅速以其客观、准确、效用等特质确立自身真理性和权威性的地位,一路高歌猛进成为一切学问的典范,与此同时,人文社会科学日渐式微^[2]。19世纪初,自然科学“大获全胜”,奥古斯特·孔德(Augustus Comte)宣布自然科学和哲学已经离异^[3]。进入20世纪,随着以理性为主导精神的现代性的崛起和延伸,文理之间的分野逐渐演化为斯诺(C. P. Snow)口中的两种文化,即对应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文化和文学文化,他指出,文学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还会相互憎恨和厌恶”^[4]。20世纪中后期,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开展使得机械化全面主宰人的生产、生活,对工业技术的崇拜严重挤压了对个体心灵的关照,文科面临深刻的危机。在此背景下,华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开放社会科学的概念,呼吁知识的跨界融合,摒弃单一应用型知识的取向。

基于上述梳理,不难发现,理性宰制的科学进程是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知识领域的投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存在样态体现的不仅是一种知识划分方式,也是一种社会建构的形态,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反映在科学部类的划分逻辑之中^[5]。时至今日,两种文化的刻板划分与认识鸿沟依然横亘在人们心中,对人文社会科学公共影响力萎缩的批评、公共角色功能的质疑仍不绝于耳。为什么社会需要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自我理解又是什么?新文科试图对上述疑问作出思考与回答。一方面,新文科阐释了在各种社会思潮激荡交汇,科技革命带来环境、生态、伦理等风险,个体面临精神迷失和意义危机等背景下开展文科变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新文科尝试推出“文+文”“文+工”“文+理”“文+农”“文+医”等多种知识组合方式来调和不同科学部类,使“新文

科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等注入新元素,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为新文科提出新命题和新方法”^[6]。新文科对科学部类的理解克服了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预示着知识的发展形态不再为划分方式所禁锢,可以纵向进行文科集群间的联合,亦可横向实现不同科学部类间的跨越。因此,新文科具有超学科的意蕴,其既是克服单一知识属性的一种特殊的第三种科学部类,又是不同科学部类间黏合剂一般的存在。

相较于传统文科,新文科的新不是单纯的知识内容,而是对知识内容的归纳和分类方式,对不同科学部类间关系的缔结。这种分类方式更新了知识的生产方式、生产内容,催生了知识新的增长点,增强了知识内部的凝聚性,重塑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两大科学部类的关系。尽管新文科作为一种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国家工程被提出,但是其深深植根于人类科学的历史发展规律之中,建立在知识生产变革的时代背景之中。新文科的提出再次证明科学部类的划分是人为的,这不取决于知识或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因而知识的划分方式、科学部类的归属是随着人类认知的深入和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演进的。新文科作为一种崭新的科学部类,为了弥合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分野而出现,科学部类间的分野危机是它产生的原因,而弥合分野亦是它存在的价值与使命。

(二)作为“文科范式”的新文科

新文科的定义所起到的作用无疑具有研究范式革新的意义。新文科所引领的不仅仅是知识划分方式的革新,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向。确立新文科之于范式革命的意义,就需要先了解范式之于科学研究的优先性。库恩(Kuhn)认为,范式一词有两种意义,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特定共同体解决问题的模型和范例,是本领域谜题的解答基础,换言之,是示范性的以往成就^[7]。总之,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范式为团体成员所共有,范式是团体承诺的集合,也是共有的范例。

范式与学科的关系是紧密交织的,共同体成员的专业交流与专业判断基于其共有的范式。因此,库恩将范式又称为“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用“学科”一词是因为它指称一个专门学科的工作者所共有的财产;用“基质”是因为它由各种各样的有序元素组成^[8]。稳定、统一的范式有利于同一学科的共同体成员开展研究和合作,但是范式的“不可通约性”阻碍了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为某一学科成员所认可的范式却难以被另一学科成员所理解。除阻碍学科外部的理解外,范式也限制着学科内部的活动,学科内部的范式并不关注反常,它只对其能够解决的问题感兴趣,一旦反常出现,现有范式便面临挑战。研究者试图解决问题和困惑,而答案又隐藏在其所利用的范式里,范式影响着问题,也影响着答案,但人们仍然不愿摆脱旧范式所给予的安全感^[9]。

上述现象可被称为范式所框定的“规范科学”模式,该模式内部固守着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新文科将范式重新释义,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转换和范式共享,并增强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间的范式理解。如前所述,范式是团体承诺的集合,因此,新文科是一种特殊的、涉及团体承诺重建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通约性的精神遵循和通约性的方法遵循。在精神层面,研究者们共享承诺,偏狭的圈地意识被抛弃,文科主动融入工、理、农、医等,人文社会科学的成员不再是人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问题的唯一关注者;在方法层面,以往板结的学科建制被击碎,思辨的精神和实证的精神相交汇,各学科在新文科领域共享研究方法、共享既往解决问题的范例。可以说,新文科的范式革命意义在于打破常规壁垒森严的学科范式框架,赋予范式以朴素的通约性,共享了一种开放、交融、可无限延展的范式框架。在未来,我们能够也应当无须诉诸特定范式来界定特定的科学共同体,而新文科无疑是带领我们从规范科学走向开放科学的一个崭新的转折点。

二、新文科建设的组织逻辑审思

如何理解新文科,这不仅是一个概念解读问

题,更是一个需要对其背后的组织逻辑加以审思的问题。从新文科建设对人文社会科学时代性、学术性、专业性的要求来看,新文科着力推进传统文科在知识生产、学术组织及话语体系中的创新和变革。因此,对于新文科建设来说,知识、组织结构、权力三维度是解读多重组织逻辑时需要统合考虑的。

(一)知识生产方式变革是新文科建设的第一重逻辑

知识和学科是一对彼此映照的概念,知识是学科的内容构成,学科是知识的具体形态表达,是知识生产制度化的产物。时代发展催生着知识生产变革,知识生产变革影响着学科演进,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生产方式变革是新文科建设的首要逻辑遵循。

从前工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如今的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生产方式经历了多种模式变革,学科也正是基于模式变革而不断进行自我建构。吉本斯(Gibbons)基于模式特点将知识生产模式进行了划分与命名,传统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模式被称为“模式1”,20世纪80年代后超越学科界限、以应用性为主要特征的知识生产模式被称为“模式2”。在吉本斯的模式划分基础上,埃利亚斯·G·卡拉雅尼斯(Elias G. Carayannis)等提出“模式3”的概念,该模式强调“创新网络”和“知识集群”^[10]。“创新网络”意在将大学之外的主体纳入知识生产活动中,组建“大学—产业—政府—公民社会”的知识生产网络;“知识集群”意在消弭学科边界,创建多层次、多边的知识体系。综上,由知识生产模式的革新可见,知识生产的重心经历了由为了知识而知识—为了应用而知识—为了创新而知识的改变。

学科的演进逻辑与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轨迹一脉相承,新文科建设是“模式3”在知识生产实践中的应用。在人工智能时代,人文社会科学不仅仅是满足人类闲逸的好奇心,更是需要考虑在日新月异的信息化社会如何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心灵相处的问题,而精细的分科治学无法解决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复杂问题。新文科正是在此背景下寻求解决之道以应对人类复杂的生产生活情境。例如,新文科尝试在文科与工科的结合中,新建能源与气

候经济学、设计艺术哲学等专业;在文科与医科的结合中,新建生命伦理学、医学信息学等专业;在文科与农科的结合中,新建农业经济学、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等专业;在文科与理科的结合中,新建计算法学、金融科技等专业;在文科与文科的结合中,新建经济哲学等专业^[11]。上述构想无不体现新文科正力求突破以单一学科为单元的知识生产方式,搭建创新网络、组建知识集群,塑造以立体的学科交叉网络为载体的知识生产方式。

(二)学术组织结构重构是新文科建设的第二重逻辑

学术组织是以学者为核心、以知识生产为目标的基本学术单元。以往以单一学科为单元的知识生产方式决定了学术组织结构的高度同构性,同一学术组织基本均由同一专业背景的人员构成。这意味着学术组织内部的研究视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工具很难延展和革新,加之学者们本身也是专门化教育的产物,学科规训便在相对封闭的学术组织内部不断延续和强化。因此,学术组织结构的高度同构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科间的交叉融合。

新文科在打破单一学科为基本单元的知识生产方式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学术组织结构的重构。新文科视域下,学术组织结构重构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空间结构上重构,即学术组织的组建方式突破传统科层制的限制,不再以固定的系科划分为唯一的组建方法。新文科试图淡化学术组织内部成员的系科归属,强调边界的模糊、边界的拓展,以及作为交叉学科的“新边界”的建立。学术组织不再是固定在砖瓦结构内的科系院所,而是一个开放的网络化系统,组织结构实现了从实体化向虚拟化、从单位化向网络化的空间转变。二是职能结构上重构,即学术组织的作业方式不再是仅仅围绕单一学科问题,而是面向更为复杂的问题情境。新文科视域下,学术组织的职能不再是仅仅服务于某一具体学科的知识生产,而是服务于共同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甚至更为广阔的科学领域。学术组织的职能结构从简单化向复杂化、从单一性向丰富性的转变,这将是新文科对于学术组织职能向度的扩展。从传统文科到新文科,这样的职能扩展并非要将每一位文学家、史学家等塑造成无所不通的全

才,而是鼓励其与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协作,缔结人文社会科学内外部关系,促使人文科学研究自觉由以往“单兵作战”的职能向度向“集团军协同作战”的职能向度转变。

(三)权力向度转移是新文科建设的第三重逻辑

福柯(Foucault)曾有言:“人们常常谈论人文科学轻率地或画蛇添足地带有意识形态,然而,它们的这种技术手段,这种细微的操作模式,这种司空见惯的检查方法,难道不是在一种机制中贯彻能够提取和建构知识的权力关系吗?”^[12]如其所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知识与权力的交织是最深入和全面的。分析知识生产中的微观权力面向,可以发现,权力规定不同的真理标准,制定真理的程序和方法,制造知识对象和知识领域。在“权力—知识”的话语建构中,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不同文化间的地位争夺和权力斗争。新文科建设提出“中国话语”这一关键词,这体现出中国学界对知识生产中权力向度如何转移的思考,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如何进行主体性阐释与建构的思考。

回溯历史,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话语于世界无处不在,我国的学术体系受欧美国家影响较大。就大的学科分类体系而言,文理工医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自西方移植;就文科内部小的学科概念而言,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命名也来自西方。对西方学术体系极强的依赖性直接导致我国在知识话语掌握中的劣势,使得我国学术体系建构的主体性受到压制。然而,随着世界秩序的重塑、全球治理机制的完善及多元文化的发展,知识的话语权正逐步从西方世界向全球转移扩散。当前新文科指向的正是在权力向度转移的背景下如何把握知识与话语、知识与权力之轴,成为知识生产的主体乃至解释世界的主体^[13]。在权力向度转移的逻辑遵循下,新文科建设有其不同层面的使命。一是本土的知识话语构建。话语体系是一国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展现系统,是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面向世界的有效表达,涵盖了掌握学术话语权、展示研究前沿和学术特色等多种功能^[14]。新文科将着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先进文化,形成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学派,这对于树立文

化自信、助力大国崛起有着重要意义。二是时代的人文精神反思。新文科不仅力图弥合文理等科际间的界限,也在着力消弭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跨地域、跨文明的知识偏见。因此,新文科的提出不仅是文科研究与教育的转变,更是人类对于不同知识的态度、知识间关系与联结状态的思考。在不断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的人文基础中,新文科有了更为宏阔的意义。

三、多重主体性建构下的新文科实践路径探索

透视新文科的组织逻辑,可以发现:知识生产方式变革、学术组织结构重构、权力向度转移对新文科知识、新文科学术组织、新文科学术话语体制的主体性构建与表达提出了新的要求。多重主体性建构既是对新文科组织逻辑的现实响应,也是探索新文科实践路径的内在理路。

(一)新文科知识的主体性建构:从单一学科建制到网络化知识集群

新文科建设的核心目的是文科知识生产,而文科知识生产的首要问题便是文科知识的主体性构建,包括生产什么样的文科知识、如何生产文科知识等议题。在知识生产方式变革的背景下,新文科将人们习以为常的“知识”概念放在文、理、工等不同知识领域的交叉地带进行思考,同时反思知识的分类方式和组织结构,力图破解单一学科建制下知识被分类、被客体化的困境。自19世纪学科制度诞生,人类知识生产活动便被纳入学科框架中进行管理,知识被权力统一规划为一个个秩序化的“格类栏栅”。此种单一学科建制下的知识生产与划分方式与知识自身的主体性相悖:知识是多边的、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创新有机体,知识的生长交融是流动的,知识之间不存在“不可渗透的边界”。科类划分难以囊括海量的知识、穷尽知识的类别,亦难以促进知识的交汇。在知识生产模式3视域下,知识的主体性表达不应困囿于学科建制之中,知识只有融入人类整全的知识系统才能够最大化其意义与价值,相应地,知识的主体性建构将在与其他知识交融中生成,而生成方式表现为从单一学科建制到网络化知识集群转变。因此,打造网络化知识集群

是新文科知识生产及其主体性建构的核心要点。

知识生产模式3以知识集群、创新网络为核心要件,以“大学—产业—政府—公民社会”四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为知识生产的适应性情境,强调知识自身的多维聚合性和知识生产主体的协同性^[15]。据此,本研究提出了新文科网络化知识集群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该模型以大学生态系统作为内部圈层,以社会生态系统作为外部圈层,以描绘新文科知识生产中学科集群和部门集群的竞合关系和结构方式。所谓学科集群,是指各学科突破学科边界形成的相互协同、功能耦合的学科聚集体;所谓部门集群,是指知识生产中大学、政府、产业界、公民社会等利益相关组织构成的跨部门联合体。新文科网络化知识集群的形成与拓展与整个知识生产系统的多元结构及行动逻辑紧密相连,既需要大学生态系统内部学科集群的支撑,也需要社会生态系统中多元主体的协同共进。具体而言,一方面,探索学科会聚的良序结构,打造新文科学科集群生态链。新文科学科集群的建设应以学科群方向及功能为指针,构建“核心学科—次核心学科—其他学科”的学科集群网络结构。在宏观层面,以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密切相关的人文社会学科为核心学科联结次核心学科和其他学科,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发展需求;在微观层面,以各高校优势人文社会学科为核心学科,联结理、工、农、医等次核心学科和其他学科,既改造升级传统优势人文社会学科,又促进了高校内部异质性知识与资源的流动,提升了高校学科建设的集团优势。学科集群生态链的构建除了探索学科集群内部学科的结构关系外,还应发挥核心学科的中介功能,联结不同学科集群,以促进学科集群外部网络结构的持续聚合和动态演化。无论是学科集群的内部组建还是学科集群之间的外部联系,都应认识到学科会聚不是简单的要素叠加,须以知识的亲缘性和互补性为两大基础原则,关注不同学科的知识基础和结构特征,分析学科协同发展的可行性,唯其如此,才能形成科学的互倚互促的学科网络结构,最大化发挥学科集群的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和联合效应。譬如,有学者以财政学为例,规划其在新文科视域下的发展路向,指出财政学应突破经济学单学

科的传统与局限,从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行为学、法学等不同学科视角进行跨学科研究,同时高度关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在财政管理领域的应用^[16]。该构想形成了以财政学为核心学科,以政治学、社会学等共通性较强的学科为次核心学科,人工智能等工学学科为支持学科的学科集群网络结构,兼顾了知识的亲缘性和互补性原则,符合学科会聚从邻近知识领域向遥远知识领域扩展的规律。另一方面,探索多元知识生产主体的竞合机制,打造新文科部门集群生态链。以“大学—产业—政府—公民社会”组成“四重螺旋”动力机制的知识生产模式³要求我们联合多元知识生产主体,以创建融学术文化、社会文化、企业文化、公众文化为一体的跨部门联合体。打造多元主体协同共进的新文科部门集群生态链,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一是目标协同,寻找多元主体利益诉求的“聚合点”,以诸如医疗、教育等主题的社会公共事务带动多主体互动,以凝聚新文科知识生产的目标和方向;二是制度协同,突破以学术逻辑作为知识生产的单一制度逻辑,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制度逻辑纳入新文科知识生产的考量之中,丰富新文科知识生产的制度逻辑框架;三是文化协同,加强各主体的文化互动,以促进学术文化、企业文化、公众文化等的相互认同,共建新文科知识创新文化生态^[17]。

新文科对权力规划下的单一学科建制进行了反思,试图通过学科组织结构的优化调整,重塑整体性、关联性、非线性的知识生产系统,以破解权力规划下知识生产的路径依赖和组织屏障。无疑,新文科并非主张摒弃传统学科建制,而是利用复杂系统思维对学科间界限的有效性跨越作出思考,探讨如何保持人文社会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一与多”的有效联结和合理张力,同时关注多元知识生产主体间的跨界合作。因此,新文科视域下,人文社会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大学与其他知识生产主体之间的关系开启了由简单线性关系向复杂网络关系的转化。网络化知识集群是一个兼具组织特征与知识属性的概念,其不仅表征新文科知识的理想样态,也在理论层面为新文科建设搭建了一个多层次、多形态、多节点、多主体和多边互动的知识生产组织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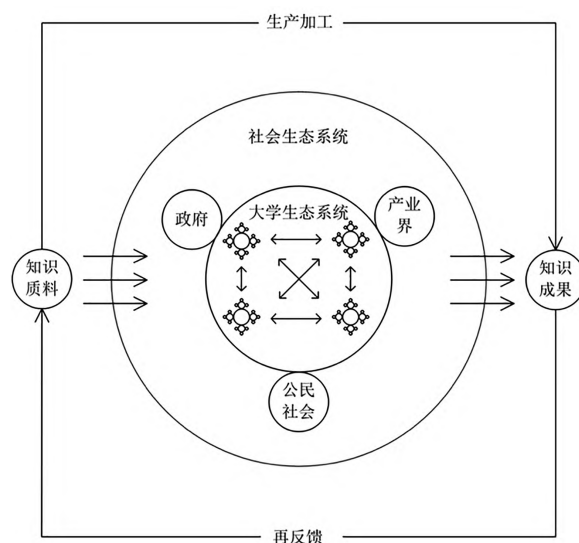


图1 网络化知识集群概念模型

注:图中“大学生态系统”内部的○表示学科,各学科集群以核心学科为中心呈网络状会聚、延展。

(二)新文科学术组织的主体性建构:从刚性学术单元到松散耦合学术社群

以院系为单元的学术组织建制是构成学科规训性权力的主要实践方式,学术组织成员被鼓励以自己的专业而非整个科学家群体来互相认同。这种行政管理范畴内的“认同”有利于实现大学对学术人员的有序管理,却不利于学术组织自身的主体性建构与表达。如哈贝马斯(Habermas)所言:“这是以目的理性作主导的子系统侵害了以互为主体性原则建构的结构的一个过程。”^[18]鉴于此,文科学术组织的主体性建构应成为新文科深入践行的必由之路。

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要求作为主要知识生产者的学术人员从封闭的学科归属走向开环的学术系统,因此,新文科学术组织的主体性建构必然要求学术组织的建立突破传统科层体制,下移组织权力重心,搭建扁平化的组织架构,赋予组织自我组建、决策和执行的权力,促使组织完成从刚性学术单元到松散耦合学术社群的转变。所谓松散耦合的学术社群,是指组织一方面相对独立于科层结构,以分布式、非线性的组织结构减少行政干预,增加组织成员的自主权;另一方面,组织成员以共同的学术旨趣为组建契机,以共同的问题解决为组织目标。基于此,以何种组织形式搭建学术社群,将成为新文科学术社群组建和发展的基本问题。

新文科建设可探索以下多种组织形式的学术社群。一是延拓非线性的科研平台。新文科以问题为平台整合学科,而非以学科为平台切割问题,其建设思路便是弱化学科分类、突出问题解决。未来新文科建设的组织形式可从延拓非线性的科研平台着手。非线性的科研平台意味着知识资源的复杂化、人员构成的多元化及流动化,知识生产的组织形态不再局限于静态结构,可基于研究项目组建科研平台,面向全球招聘项目研究人员。此种非线性科研平台实现了跨学科、跨地域的知识流动和人员联结,促进了学术共同体的智慧交汇。二是组建多中心的新型智库。如果说非线性科研平台的搭建是注重知识本身的生产,那么多中心新型智库的组建便是基于社会需求融知识生产与知识应用于一体。未来新文科建设可依托高校、企业、社会力量共同组建新型智库,共同研讨医疗、教育等主题的社会共同事务,产出包括学术研究、资政报告、商业应用等丰富的成果形式,使其发挥政策模拟、决策辅助的重要功用。三是建立多元主体聚合的新文科实验室。不同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实验室,人文社会科学实验室以复杂的社会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其既是为研究者提供数据支持和网络协作的科学平台和智能空间,又是为社会治理提供智力支持的组织机构。新文科实验室可由高校牵头组建,负责技术引入和秩序管理;企业可通过项目赞助、顾问聘请、成立联合实验室等合作关系发展与学界的协作管理机制,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政府则充分发挥其信息资源库的作用,共享电子政务数据、民生舆情数据等各类数据资源^[19]。此外,探索大数据等技术在新文科实验室中的运用,使得现代科技真正为人文社会科学建设赋能增值。

新文科视域下松散耦合学术社群的建立将重塑文科学术组织的生存样态,进而凸显学术共同体的共同意志和学术个体的学术追求。松散耦合的学术社群具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它基于共同的学术意志形成;二是它是一种群体内部自由协定的约束关系;三是它是个体主体性与群体主体性高度聚合的体现。可见,松散耦合的组织结构使得学术组织成员完成了从行政身份束缚到自主商定学术契约的转向。如果说以往学术契约以“职业约定”的

方式存在,学术个体的自我认同和组织认同来源于行政权力的外在约定,那么松散耦合的学术社群中学术个体的自我认同与组织认同则来源于对新文科知识生产与创新中的探索与争鸣,而这种自我认同和组织认同促成了整体学术组织的主体性建构与表达。

(三)新文科学术话语体制的主体性建构:从欧美中心视点回归本土话语诠释

自19世纪兴起的人文社会科学是一种以欧美为中心视点、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学科知识范式,这套知识范式内含对掌权势者有利的理论前提和意识形态,包括欧洲中心主义、科学主义、国家中心主义等^[20]。在知识与权力共轭中,欧美国家将她们书写世界与书写自我的方式转译为制度现实并影响世界,以此实现国家权力和学术话语体制的相互模塑。显然,这种所谓的知识范式的“正统模式”长久支持、巩固着“偏狭性”学术话语体制的生产与传播。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制的“偏狭性”一方面忽视各民族、国家间的异质性,另一方面压制非欧美国家学术话语表达的自由与勇气,最终将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新文科的提出正是建立在对欧美中心视点下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话语“偏狭性”的审视与思考之上,表达了我国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制主体性建构的决心。

新文科建设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话语从“被诠释”到“自我诠释”的权力关系转化的关键步骤,意味着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制将逐步进入以本土语境为核心的话语体制建构中来。此前,人们对本土话语体制的构建要义未能形成清晰的认识,对本土话语体制区别于欧美中心视点话语体制的独特性未能充分挖掘,这导致我国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构建中国话语一直未能真正有效践行。新文科视域下,进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制的主体性建构,需要以“中国问题”和“中国特色”为两个基点,“中国问题”是中国学术话语的生长基质,是知识生产的动力来源,“中国特色”是中国学术话语区别于其他的独特声音。首先,找准“中国问题”,以问题为牵引,建构对“中国问题”具有本土解释力和本土价值的新文科学术话语体制。所谓找准“中国问题”,是指充分识别中国政治、经济、文化

等领域遇到的真问题。不同于世界近代史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进阶式转型,中国交织进行了上述两次转型,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将是多元复合的、独属于中国自身的。当前,经济社会和科技领域的“卡脖子”问题是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进程中亟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此类问题的破解需要融通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解释框架,而新文科致力于搭建融通桥梁去解释问题、解决问题,在此过程中,立足于中国情境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将不断丰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力量将持续提升,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制也将在本土实践中最大程度发挥其诠释力与指导性。

所谓宣传“中国特色”,是指在新文科建设中寻找文化归属,挖掘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特色内涵,将中国特色文化融入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之中,使得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承载中国独有的文化风格和民族气质,进而诠释中国话语。新文科视域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新”与“特色”首先应体现在理论创新。唯有在解释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之上凝练原创性、特色性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可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立言。反观当下,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甚少提出原创性理论,特别是受到国际同行普遍认可的原创性理论,更不用说引领国际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前沿的理论。譬如,我国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与经济领域的发展存在严重的理论突破与实践成果的落差,经济学理论研究落后于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实践,且现有西方经济学理论也难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路与成就。在新文科建设的契机下,若充分开展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创建出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体系,那将是极具国际影响力的重大理论突破,必将助益我国经济学研究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其次,“中国特色”还应体现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特色高峰学科的打造。新文科特色高峰学科的打造有赖于内外联动的学科建设规划和宣传战略。一方面,加快传统优势文科改造升级,寻求特色学科的深度开发。特色高峰学科是彰显学科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也是我国新文科顶层设计中的关键目标。开拓新文科特色高峰

学科,需引导各高校对标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结合自身学科专业特色,以原有优势文科为主干,搭建学科群生态系统,自主研判交叉学科生长点以探索设置前沿学科、紧缺学科等,实现学科造峰;另一方面,树立学科品牌,加强新文科品牌宣传。学科品牌是学科特色在社会层面的重要输出,新文科特色高峰学科的打造离不开学科品牌的树立与宣传。积极地对外“营销”可以增加学术界对学科建设成果的感知度和认可度,提升学科在领域内的话语权^[21]。在新文科建设中,着力丰富新文科学科品牌的宣传方式,拓宽新文科建设成果的应用渠道,使之学术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得到有效传播,扩大新文科特色高峰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度、美誉度和影响力。此外,在建设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同时,须以“人类知识共同体”的包容视野为逻辑起点,使得中国文化以普遍知识的形式有机融入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之中^[22]。

“如果社会科学是一种寻求普遍知识的活动,那么,‘他者’在逻辑上便不可能存在,因为‘他者’是‘我们’的一部分,而‘我们’既是研究的对象,又是研究的主体。”^[23]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制的主体性建构需要我们从“欧美中心视点”的框架中抽离出来,完成“他者”到“主体”的角色转换,在尊重“人类知识共同体”的基础上凝练中国特色、诠释中国话语。

四、结语

新文科的提出在带领我们探索何为文科之“新”的同时,也在实践摸索中助力文科之“兴”。通过新文科建设这一契机,我们得以重新思考知识生产、分类、传播中的权力向度以及知识自身所附带的权力性质,从而为克服权力对知识自身、学术组织、学术话语体制的支配提供破解思路。因此,新文科不仅仅是单纯的学科建设问题,更是让我们思考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人与知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面向未来,人类的研究和教育必将脱离狭隘的学科分野和知识界限,面向更为广阔的人类全部物质世界和心灵世界,面向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多元文化冲突和融合。可见,新文科建设

便于我们提前为未来纷繁、复杂、多变的研究生活和教育生活做好准备,而这样的准备离开不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性建构。当前世界正在遭遇生态的破坏、战争的威胁、社会秩序的急剧转变、思想和意识上的不安定,如何令知识的增长真正为人类的长远利益和共同福祉服务,让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不仅是追求知识的活动,同时还能够发展出足够的自我反省、自我建设的能力,这是新文科建设的应有之义和长远追求。

参考文献

- [1]贾文山,马菲.从对中国新文科的回望到对全球新文科的畅想[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2):104-111.
- [2]刘振天.文科知识生产的本土逻辑及高校新文科建设的路径[J].中国高教研究,2021(11):7-14.
- [3][23]华勒斯坦,儒玛,凯勒,等.开放社会科学[M].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1,61.
- [4]C.P.斯诺.两种文化[M].纪树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4.
- [5][9]吉尔德·德兰逊.社会科学—超越建构论和实在论[M].张茂元,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1-29.
- [6][11]中国教育在线.吴岩:积势蓄势谋势,识变应变求变,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EB/OL].(2020-11-03)[2020-11-11].https://www.eol.cn/news/yaowen/202011/t20201103_2029662.shtml.
- [7][8]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76-191.
- [10]黄启兵,田晓明.“新文科”的来源、特性及建设路径[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2):75-83.
- [12]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208-209.
- [13]陈恒.世界知识生产视角下的新文科建设[J].探索与争鸣,2021(10):9-12.
- [14]张越.由史学转型看新文科视野下的学科建设[J].探索与争鸣,2021(10):30-33.
- [15]武学超.模式3知识生产的理论阐释—内涵、情境、特质与大学向度[J].科学学研究,2014(9):1297-1305.
- [16]马骁,李雪.创新与融合:学科视野中的“新文科”建设[J].中国大学教学,2020(6):31-33.
- [17]白强.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下一流学科建设的逻辑转向与机制建构[J].大学教育科学,2022(5):14-22.
- [18][20]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M].刘健芝,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3,131.
- [19]王震宇,薛妍燕,邓理.跨越边界的思考:新文科视角下的社会科学实验室探索[J].中国高教研究,2020(12):61-68.
- [21]沈忱.品牌管理视域下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行动策略—以江苏高校为例[J].江苏高教,2021(6):58-62.
- [22]崔延强,卫苗苗.现代科学学的现代性问题—从现代科学学的起源看[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39-48.

The Revitalization of Liberal Arts Through the “New” Liberal Arts —Reflections on the Connot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Organization Logic of New Liberal Arts

Zhang Su & Zhang Zhonghu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 revolution of science paradigms, the proposal of new liberal arts transcends traditional “either-or” classifications of science disciplines, and reshapes a new paradigm of liberal arts that fosters compatibil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method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heterogeneity of academic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the power shift of knowledge discourse from western centrism to globalization are the triple guiding logic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Looking to the future, feasible path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include: shifting from a single disciplinary framework to networked clusters of knowledge; evolving from rigid academic units to loosely coupled academic organizations in new liberal arts; and returning from a Euro-American centered perspective back to local discourse interpretations.

Keywords: new liberal arts; connotation identification; organizational logic; knowledge production; paradigm revolution

责任编辑:曾 艳